时间证人:幸存者李长富的99年



[编者按]截至目前为止,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0人,当亲历者逐渐退场,记忆靠什么继续存活?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即将来临之际,扬子晚报策划“重生|那些从1937年走过来的孩子”系列报道,锚定“此刻还在的人”,而从“活下来之后的一生”切入:1937年冬天活下来的孩子,后来怎样长大、怎样老去,战争如何在一个人的生命轨迹中持续发生作用。

重生

吃完早饭,李长富坐在厨房门口的凳子上休息,临街的墙上挂着一面国旗。见到记者,他热情地起身打招呼,认出在一个月前的重阳节活动上碰见过。

李长富99岁,现在仍然一个人住在老屋,由六个子女轮流来帮忙照顾。

89年前的那个冬天,他和父母、兄弟一同藏在地窖,躲开了日军的烧杀抢掠。如今,父母、哥哥都已离世,只剩下他和弟弟,成为那段触目惊心的历史的“时间证人”。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臧磊**

一

“说是照顾,其实也就是买买菜做做饭,偶尔他也自己烧饭、炒菜。”李长富的大儿子李学珍告诉记者,今年3月1日之前,老人一直一个人生活,自己烧饭,自己收拾家。“尽管身体健康,可毕竟年近百岁,一个人住着,万一摔一跤,身边没人不行。”李长富主动提出让子女排班来照顾他。

如今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人到家陪着他,“一早7点到,晚上7点左右,吃完晚饭洗好碗,便起身回家。走之前陪他说说话,看他洗了脚,或是洗了澡,才放心道别。”

白天无事时,李长富坐在厨房门口的凳子上,和来来往往的邻居们打招呼,说说话,或者就在门口走走。家中工具房整齐摆放着手工工具、生活器具。他坚持每日拉伸锻炼,甩甩腿,抖抖胳膊,保持好心情。早些年读报是他不变的习惯,现在年纪大了读着有点吃力,但还是会读。墙上的挂历他每天自己记,哪天谁来拜访,哪天洗澡,哪天排便……一笔一画记得清楚。

李长富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可往前追溯,这样安稳的日子,是从一个10岁孩子蜷在地窖里的那个冬天走过来的。

1927年10月1日,李长富在南京长芦乡出生,共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10岁那年,日本鬼子进村,一家人躲进早前挖好的地窖里,不敢出声,连呼吸都压着。“地窖大概有1.5米直径,深也有1.5米。窖顶用木棍支撑,上面堆放稻草。”李长富至今都记得地窖的样子,那是听闻鬼子要到六合来,他们一家做的准备。

地窖内黑漆漆的,外面是杂乱的脚步声、砸门声,还有呼啦啦的响声,后来他才知道,这响动是大火在风中飘摇的声音。一个十岁的孩子,蜷在黑暗里,听着头顶上的世界被烧毁。等他爬出来再看这个村子,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连猪圈里的猪都被烧死了。“我们一家人就哭啊哭啊……”回忆起那段往事,老人低垂眉眼,停顿,表情黯然,他说他记不得那年冬天他们一家是怎么度过的了。

躲藏在地窖里的经历是李长富长久的梦魇,想起来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恐慌与战栗,但这不妨碍他要将这段真实的历史传承下去,“他经常讲,不仅和家人讲,也包括亲戚、朋友和邻居,他都会讲。”李学珍说。

为什么要坚持给大家讲述这段历史?2016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上,李长富回答过这样的问题,他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如今,和他一同藏在地窖里的家人多已离开人世,只有李长富和小他2岁的弟弟李长贵成为那个历史片段的最后见证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日本右翼势力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史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面向全球长期公开征集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资料和证人证言。日本右翼的态度让李长富愤慨,他写了一封信给纪念馆,将自家经历讲述出来,从而被认定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其实我叔叔也是幸存者。当年我父亲披露一家人的遭遇,其中也包括他,但他觉得一个家庭有一个人出来讲述当年的事实就够了。”李学珍说。如今,李长贵也住在大厂,安享晚年。

二

走进李长富住的青砖瓦房,屋内没有特别讲究的摆设,中堂大画、家族大合影,纪念馆赠与的纪念物品,很是平常,相比之下,“时间证人”这个四字条幅,悬挂在墙上最高处,相当醒目。

这四个字是艺术家吴为山所写。“很有名的教授,所以叫他题字,我是南京大屠杀当时的见证人,所以叫时间证人。”每每有人来访,老人都会指着墙上的字给人解释,这四个字的含义。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幅字的木框是李长富自己买木条做的。“对于手艺人来说,都不是事。”李学珍解释说,李长富做了一辈子的木匠活,直到现在还会时不时地做些木工小物件。

说起学木工的经历,李长富的讲述将时间拉回到1943年。“那时候农田比较紧张,我母亲托人带我去傅佐岗学手艺,做箍桶,学了三年。”1946年出师后,李长富回长芦乡干了一段时间农活,还是回到南京,在珠江路、山西路一带开了家小店,做洗脚盆、水桶、桌椅板凳。再后来他又回到老家,在西厂门开了间箍桶店。所谓西厂门,是永利铔厂的西门,那是大厂最繁华的地方。

李长富常跟人说,解放前,手艺人“自生自灭”,没人管;共产党来了,把大家组织起来。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1956年2月6日,这个日子他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在有关部门组织下,包括他在内的木匠、篾匠、铁匠、竹匠4个行业共20个人组了一个木器厂,他当厂长,“我读过7年私塾,会打算盘。”对于这个机遇,他这样归结原因。

到1966年,木器厂已经有40个人,但不幸,一场大火把厂房烧了。厂子没了,人不能散。他把人放出去,到各个厂去做零工,浦镇工厂、南化、南京热电厂,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

1969年,当地准备建南京磁性材料厂,人手不够,木器厂的人又全部被拉了过去。“我当厂长,带领职工从建厂房干起。我们主要生产磁铁,用于扩音喇叭。当时政府号召全国农村,村村通广播。南京无线电厂一厂、二厂、三厂都要我们供货。”厂子越做越大,到1987年他退休时,磁性材料厂已经有四百号员工。李长富是从这个厂的厂长位置上退休的,说起当年,他的眼神都亮了,“底下设了七个科、四个室。”老人笑着竖起一根根指头说。退休以后,李长富感觉自己还能干得动,又在建筑工地上做了10年的监工,“1997年我才正式退休,算是二次退休”。

三

99岁。

南京沦陷、日本人投降、解放军进城,李长富都亲历过。回想过去,有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记忆片段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他脑海里闪现:

1943年,进南京城当学徒,因为读过私塾他协助不识字的老板做生意。那时白下路全是日本人的商铺,日军开着军车在山西路、湖南路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日本人投降当天,他亲眼看到上午还挎着军刀不可一世的日本兵,下午就卸下了军刀,帽子、领章都不戴了;日本商人被集中在挹江门附近的空地上,搭着临时帐篷,等待遣返。

南京解放的那天晚上,李长富就在南京城内,第二天早上他看到,“南京的大街小巷,解放军把枪架在一起,靠着墙睡觉,纪律真严明”。

李长富还常和子女们讲一个“对比”。解放前,他挑着木工工具打算过江去,结果被国民党军队抓住,让他干苦力,修了几天床,“分文没给,中午吃的是糙米饭、青菜饭”。

南京解放后,他给解放军做木工活,到了中午,部队留他吃饭,“拿个勺子在锅里头挖一勺子红烧肉”。老人说到这里,语气里还带着当年的惊讶。两下对比,老人说:“难怪国民党打不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也是李长富22岁生日。站在100岁的门槛上,老人说,从那一天起,他不再是那个在浦口码头被国民党拦下来修床、分文拿不到的年轻木匠,也不再是那个挑着担子在人山人海的江边熬一整夜的逃难者。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活成什么样,但他后来成长为了合作社主任、木器厂厂长、磁性材料厂厂长,连他自己都有一些意外。这一天,是他生日,也被他视为重生的日子。

李老家教严格,家风淳朴。如今四代同堂,35口人,全家共有13名中共党员、1个博士、2个硕士。在李长富的教导下,他们家也出了一位记忆传承人,李学珍二弟的儿子李宗辰。

李长富的一生,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百年史:1937年,家屋被日本侵略者烧毁,他只身到南京当学徒;从个体手工业者,到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合作化道路;从木器厂被大火焚毁,到在政府协调下参与建设磁性材料厂。回望这些经历,老人深有感触。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在大厂街道举办的“辉煌百年路,奋进新大厂”活动大会上,他感叹:“祝愿我们党越来越好、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会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永远跟党走……”

如今,每天清晨,李长富会走到屋外,亲手把一面红旗挂起来。旗杆是他自己做的,滑轮与卡扣也是他自己设计的。挂旗的机关做得相当精巧,可以挂小面红旗,也可以树大杆,挂大旗。邻居早已习惯,知道这老爷子每天都要挂旗,下雨天也挂,冬天也挂,一天不落。“我每天清晨升起国旗,就是想感谢党和国家,让我们过上了如今的好日子!”